



鲁北党史人物传略

(第一辑)



中共德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鲁北党史人物传略

第一辑

中共德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 李宗鲁传略 中共禹城县委党史征委会(1)
王凤岐传略 赵春万(10)
马振华传略 任天奇 张连生(13)
张策平传略 中共宁津县委党史征委会(18)
吴匡五传略 中共陵县县委党史征委会(21)
英勇顽强抗战到底
——抗日县长余致远烈士传略 乐陵县民政局(26)
李聚五烈士传略 中共齐河县委党史征委会
抗日救亡的开路先锋 齐河县县志办公室(35)
——鲁西北老二团政委王克寇传略
..... 中共禹城县委党史征委会(48)
人民歌颂武大凤
——武大风烈士传略 中共庆云县委党史征委会(70)
戚夯传略 中共武城县委党史征委会(79)
德县抗日县长
——张硕烈士传略 中共陵县县委党史征委会(84)
巍巍青山耸云间
——李青山烈士传略 中共陵县县委党史征委会(87)

李宗鲁传略

中共禹城县委党史征委会

李宗鲁，原名李洪儒，曾化名徐相善、李洪业、徐轩、张旭东等。系禹城县禹城镇寺后李庄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五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一九二一年毕业。毕业后，由第一师范学生孙兆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济南曾组织过禹（城）临（邑）同乡会，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组织禹城第一高小党支部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李宗鲁在禹城县城内第一高小教书，公开身份是艺体教师兼丙班班级主任。当时校长是刘学孟。一九二四年，李宗鲁与教师杨笙甫即开始在师生中宣传新思想。李宗鲁在教学中兼管指导学生的图书阅览工作，经常有计划地向进步学生介绍一些进步启蒙书籍，如《民众之路》、《科学大众》等。至一九二七年秋，他在城内第一高小，先后发展的党员有教师张巨涛，教师滕玉亭发展为共青团员。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有马云祥、王云阁（后改王兴华）、杨世荣、李济深、李树杞等；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入党的有杨中一、杨瑞亭等。杨笙甫离禹去平原，李宗鲁与张巨涛在城内“一小”正式组成党支部。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为开展农民运动，扩大和巩固左派势力，李宗鲁和杨树杞为禹城农运代表，参加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长清召

开的农运扩大会议。以后禹城、平原即有农协，且拥有红枪会组织。在城内“一小”支部领导 下，李宗鲁、张巨涛以进步学生张树杞、张树萱、韩可选、王洪烈（现名王晋新）、张连中、李洪烈、李克平等为骨干，组成讲演队，李宗鲁率领他们三十多人到禹城、平原交界杨柳寺集上讲演，张贴标语，呼口号，宣传进步思想，使群众大为震动。一九二七年为反对张宗昌征讨赤捐，李宗鲁以城内“一小”支部为核心，利用周会在校进行讲演，提出反对讨赤捐，并发动学生张贴标语，连县公署大堂上均贴到，县知事见空气紧张，即缓征收。后民众情绪缓和，反动当局便大举反攻，于是李宗鲁从城内第一高小‘被驱逐’，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便正式离开了城内第一高小。

创 建 鲁 北 县 委

一九二四年李宗鲁利用与山东第一师范毕业的杨笙甫的同学关系，结识了在河南偃师县任县长的刘耀东（杨、刘皆高密县康庄人），便离禹去偃师任教。一九二五年刘耀东调任平原县长，李与杨又随其赴平（原）。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为迎接北伐，开始秘密建立平原中心县委——鲁北县委，代号“鲁培劳”，后又改为“王代田”，李宗鲁任书记，委员有王旭鹏和李剑赤。鲁北县委驻地先在平原东关孙玉吉家的后院，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发现丁君羊（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等常从济南来平原开会，而向张宗昌告密，平原县长刘耀东受到张宗昌军法处的质问，遂将此情况告诉了鲁北县委，县委机关便搬往东关附近的督府营子。建立鲁北县委后，即在鲁北（包括高、夏、禹、平、陵、德、临、商）农

村建立党支部十二个，计党员八十七名。团支部五个，团员三十七名。一九二七年春，李宗鲁深入平原城东大五里庄，以党团员为骨干，秘密发动群众，抢了地主刘方亭准备疏散的粮食。农运名声大振。一九二七年夏，组成“鲁北行动委员会”，成员有李宗鲁、王旭鹏、杨笙甫、张宁宇，创办了刊物《露白》(鲁北)。李宗鲁托人从平原郑潘二庄弄来一台油印机，与张宁宇等在李振九的后院白天撰稿、刻钢版，晚上印刷，印完后即分送各村、车站、大街张贴。九月，山东省委派来代表延伯真、王道河、刘秋等在平原城东潘庄召开鲁北党的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高唐金谷兰、陵县王风岐、夏津刘君雅、禹城张巨涛、平原王旭鹏、张宁宇等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自鲁北县委书记李宗鲁揭露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要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针对鲁北形势，组织鲁北八县暴动，借用力量是红枪会，首先发动陵县暴动。明确了总部和各县人员的分工，李宗鲁、延伯真、杨笙甫具体领导陵县暴动的联络工作。并在陵县组成以王风岐、李益掌、杨国英、宋清海、宋建谋、于佐舟、于志良七人为暴动支部，确定于佐舟为暴动总指挥。李宗鲁帮助其制定了比较具体的暴动计划，提出了夺取乡村政权归贫农，组织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武装农民的口号和要求。暴动前李宗鲁亲自去陵县宋集村，住在宋开经家里开会，宣布成立农会，布置农协分地、分粮、借粮的措施。陵县暴动在鲁西北向封建统治阶级打响了第一枪。对农民群众是一大鼓舞，对地主豪绅、民团地保是一大震动，惶惶不可终日。遗憾的是，由于计划不周和组织

方面的错误，而使暴动未达到预期效果。

一九二八年一月，鲁北县委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沿津浦铁路北起平原城北的陈家楼、平原车站、城西南徐庄，南至禹城车站，广泛张贴传单、歌谣，散发宣传小品及有关暴动宣言（如广东暴动宣言）。在民众方面已经引起注意，尤其为官府所注视，高唐党员把标语和传单贴到县衙前，贴到老土匪李彩题（李九）的圩寨门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七点李宗鲁和黎同志（外县人）及本县张树杞、张树萱四人，将从省委带来的宣传品在禹城车站驻军营房门口张贴，被岗哨发觉，即上前将李宗鲁和黎同志扣留，二张在后，见事不妙，避开了。李宗鲁因是当地人，被保释。黎同志因口音不对，又从身上搜出传单，他直言不讳，声明和李宗鲁不认识，撒传单的责任一身承担。黎同志为掩护同志大义凛然，被随军带往天津遇害。

谷官屯暴动前后

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明春，为学习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李宗鲁在平原城东杨庄召开了鲁北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陈独秀的错误及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的任务，提出了鲁北党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抗捐抗粮，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武装等。会后，李宗鲁偕同王旭鹏亲临禹城季李胡店、安仁镇与杨中一、杨瑞亭、杨世荣、贺漫真、李安亭联系，在禹城农村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发动农民，组织农协抢坡（拔苜蓿）、借粮（清算首事劣迹令其退吐粮款）、打盐

巡、反苛捐杂税、围衙告状、不出官车，震动了反动当局。此外，又指导夏津刘君雅同志在忠信寨建立夏津县党支部，围绕武装暴动对地方武装力量做了大量的收编、教育改造工作，准备成立鲁北红军第一路，不幸遭到了敌人疯狂镇压，刘君雅同志被捕，暴动工作受到挫折。与此同时鲁北各县重点抓了农运和红枪会，烽火连天。陵县农民活埋了粮差，平原郑官屯的红枪会杀死了敲榨勒索的民团头子王金鉴，高唐的红团冲进高唐城揭露了商会会长姚公南的罪行，向其头上浇了大粪。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春荣来平原，组成了中共鲁北特委（后移高唐），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王旭鹏、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杨瑞亭为委员。特委辖平原、禹城、高唐、夏津等十一个县。特委成立不久，即着手组织高唐暴动，李宗鲁通知各委员及各县党的负责人前去参加。此会是在高唐谷官屯金谷兰的西屋召开的，李春荣代表省委传达毛委员在湖南组织工人、农民暴动经验，提出鲁北要继续组织暴动，成立苏维埃。分工是金谷兰在高唐以红枪会为借用力量，组织扩大红团，李宗鲁与杨瑞亭、杨中一在禹城季李胡店带起“老人社”配合高唐暴动。会后，按部署，杨瑞亭带“老人社”数十人，四月二十六日去高唐配合红团，用大刀、铁蒺藜打死横行乡里的盐巡四名。由于红团保密工作不周，谋杀土豪不成，恶霸地主李彩题勾结高唐县警备队长李长兴，带着配有张宗昌马队近千名武装，于五月四日黎明包围了谷官屯。李春荣和金谷兰带领群众向外冲，激战中，李春荣和红团副团长姜殿甲等十六位战士先后光荣牺牲，红团其余人马撤至禹城季李胡店整顿。谷官屯暴动失败后，李宗鲁和于赞之即去济南向省委汇报，随后金谷

兰、张干民亦赴济。省委作了指示，指出了失败的原因和今后工作的方向，并决定将鲁北特委改为鲁北特支，成立支执委主持工作，特支直属省委。

被捕后两次越狱

鲁北特委改为特支后，李宗鲁调省委任主要交通，负责省委对鲁西北的联络工作。一九二八年秋，鲁北特支负责人王旭鹏病故，随后设有禹城特支，负责人杨瑞亭，与高唐党的负责人徐新斋到济南找省委汇报工作，先在一个客栈里找到李宗鲁，由李宗鲁出面在一个饭铺里与省委负责人接头。杨在马路上边走边汇报禹城及高、恩、夏、武党的活动情况，并接受省委交待的任务。回到客栈，李宗鲁交给一大包袱省委发的文件及传单，叫杨瑞亭安全带回，分发禹、平、高、恩、夏、武各党支部。一九二八年底，由于省委王复元、王用章（后改为王天生）兄弟两人先后叛变投敌，变为张宗昌捕共的鹰犬，致使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在十二月底连续遭到严重破坏，前省委书记郑恩铭，秘书长何自清，学联负责人朱霄，省委机关会计杨一辰多人被捕，鲁北王凤岐、徐新斋等同志也先后被捕，党中央指示青岛市委书记武胡景（吴克敬）同志来济主持省委工作。至一九二九年三月，省委书记武胡景与省委主要交通李宗鲁在济南西门被特务发现，不幸一起被捕。

李宗鲁被捕后，被关押在省府前街伪警察厅拘留所内，他和徐新斋、杨一辰、朱霄被押在拘留所东北角一间囚室內，此外尚有被关押的土匪头子十六名，这些人多是直鲁联

军的军官。对面囚室内住的是邓恩铭同志。决计利用日本军队即将撤离济南，国民党军队尚未正式接收之机，发动越狱斗争。李宗鲁、杨一辰商定要越狱必须利用那十六名胆大身壮、能打冲锋的直鲁军官，并争取教育了一个军官头子李殿臣，杨一辰向他透露了越狱计划，李宗鲁对其他几个也进行了联络，他们表示愿意带头开路。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越狱准备工作还不充分，有一不坚定分子企图向敌人告密，军官头子李殿臣便仓促从事，晚八点利用上厕所之机将看守打倒，土匪军官们一齐动起手来，缴枪十余支，并鸣枪举事。此时同室的李宗鲁、杨一辰、徐新斋、朱霄等同志也不得不同时行动，而其他囚室的同志却没有思想准备，有的连镣铐也未尚打开。事已至此，李宗鲁、杨一辰和土匪军官们从东大门的南墙豁处，跳越而出，马路上的伪警进行截阻，当即被他们打死、打伤各一名，夺路向章丘方向逃去。杨一辰未出济南市，隐蔽在正谊中学校长鞠思敏家，第二天化装出城去大连脱险。而李宗鲁、朱霄、徐新斋与直鲁军官们一起逃至枣园，土匪头子们认为脱险，情绪松弛，烟瘾上来争相去买白面吸，暴露了身份，当他们逃到章丘时，便被武装警察跟踪追上全部捕回，李宗鲁又复陷囹圄。

第二次越狱是在三个月后。此时，日寇已撤出山东，国民党省府已由泰安迁来济南。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提倡“文明监狱”，犯人可与家庭通信，可与外人接见，又派专员来济南考察。高等法院忙于迎接应酬，看管松弛。我在狱同志，以邓恩铭同志为首总结上次越狱失败的教训，把此次越狱计划作得很细，把在狱同志十八人按强弱搭配成三个小队。并对越狱行动讯号和越狱后的疏散方向，都作了详尽研

究。在狱同志积极准备，利用家属探望机会带来了锯条，将厕所内搞清洁的石灰，用信封装成若干袋，放于信插，分发领取备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许，看守人员大都交班休息去了，这时，编为第一队的同志按计划出其不意一涌而出，打倒了无精打彩的看守，顺利夺下了第一道门，二、三队接扶继后。当我十八名同志逃离监狱后，敌人才仓惶追捕，邓恩铭同志体弱，走不远，朱霄、纪子瑞、王风岐、徐新斋等同志又被重新捕回。二次越狱，有六名同志安全脱险，李宗鲁和王永庆逃往东北，蓝志政和孙秀峰北去天津，吴可敬（即吴胡景）、何自声南去上海，事后，敌高等法院对我脱险同志进行悬赏通缉，每人赏格五百元大洋。

四 次 迁 徒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李宗鲁等六名同志越狱成功，国民党济南高等法院负责人因此曾受到南京政府的惩罚，济南高等法院的悬赏通缉令贴满各地，山东境内岗卡林立到处搜捕。李宗鲁越狱时摔伤了脚，他先向西南坚持逃到白马山，绕道至禹城东南的博洛屯，利用晚上到了董庆吉家（董是李宗鲁的学生）换了鞋、服，第二天化装乘车去平原，藏到刘耀东县长家里，养伤两个月，伤愈即乘车奔向佳木斯，通过他表哥邢仁×（禹城邢庄人，早年迁居佳木斯）介绍当了中学教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东北，国难当头，李宗鲁为找满洲省委，以取得联系，从佳木斯弃职转移到哈尔滨，经亲友刘福春介绍在道外承德四十九号房东刘法家里当家庭教师，化名徐相善，自称关内临邑

人，终于在一九三二年找到了满洲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至一九三六年在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一九三五年春李宗鲁曾从哈尔滨潜回禹城，与马凤元等同志取得联系，秘密在禹城北部进行党的活动，被特务告密，韩复榘电令国民党禹城县长亲自缉捕。盖景延率马队星夜包围了寺后李庄李宗鲁的家，反复搜查，无获，便将其父捕去，立逼交出李宗鲁，严刑拷打，老人守口如瓶，十余天始交乡里保释。从此，禹城境内对其搜查加紧，李宗鲁在禹城站不住脚，处境危险，马凤元派马波生将其护送到平原东关车站，乘车返回哈尔滨。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因满洲省委遭破坏，他迁居天津，化名徐轩、张旭东。起初住在城西南角杏树里，继又迁居南开怀安里，以养鸭为业，行踪不定。此时他与鲁西北一二九师交通站有联系。一九三八年一二九师设交通站于夏津的张法寺，站长张义曾派李鸿飞（禹城西关人）于农历正月十五日到天津英租界伦敦路同兴木场三号去找过他（当时李宗鲁化名张旭东，接头暗号以手指示“19”）。李鸿飞发现所找的张旭东，原来就是他的老师李宗鲁，李看信后说：“同志们离开后不放心，他（指张义）的情况我了解”，又嘱托：“水务（在平原县）有个姓费的朋友，有机会请代问好。”一九三八年夏，天津海河水势泛滥，李宗鲁驻地低洼简陋，被河水冲了，经堂兄李洪达介绍，秋季迁往沈阳大北边门外十间房，以养鸡度日，继续与当地党组织联系，昼夜奔忙。据其妻回忆，在沈阳十间房住时，李宗鲁常被特务跟踪盯梢，穿皮卡克的便衣特务拿着枪经常闯进家里搜查，其妻多次为其隐藏文件，经特务恐吓敲诈，经常保持紧张状态，致使神情一度失常。

一九四〇年，李宗鲁由于多年来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为党工作颠沛流离不避艰险，终因积劳成疾而患肺结核，最后病故于沈阳小河沿盛京施医院。

李宗鲁一生为革命宣传鼓动，从学校中被驱逐，在鲁北发动暴动，多次被捕，保释不成便越狱，在白色恐怖中为寻找党组织，关内关外，隐名迁徙，早已把生死、家庭置之度外。如一九二九年，他被关押在济南监狱，其父托人请律师营救，一次即卖去家中土地二十七亩，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李宗鲁在狱中对其父劝说：“国民党的法官不讲理，我们的官司是打不赢的，家中要做思想准备，别再花那冤枉钱啦，我是一个鼻的罐子喝（豁）上啦，生死由他。我相信不久共产党员就会成功的，我死了，有共产党代儿照顾您老人家，您还是有儿女的……”他对革命百折不挠，充满了胜利信心。这种大无畏精神，永远为革命后代所敬仰。

（戴洪渐执笔）

王风歧同志传略

赵春万

王风歧，又名韩广德，字鸣周，一九一一年生于德州地区陵县土桥公社刘辛庄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共党员，系鲁北早期重要共产党员之一，曾任中共鲁北特委团的工作负责人，共青团山东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二八年底在平原县被捕，一九三一年在济南被敌人杀害。他一生虽然短暂，但

却名垂青史。

在王凤岐的童年时代，社会上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潮流，激荡着刚懂事的王凤岐幼小的心灵。他同情他们家中扛活的，对社会上有富人，有穷人的现象提出了问号。九岁到十五岁，王凤岐在自己家乡读书。“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土桥高小读书，日本人枪杀中国人，使王凤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中华民族有亡国的危险。王凤岐以青少年特有的热情投入到反日斗争中去，集市演讲，抵制日货。他的演讲口才好，讲的感情真挚，赶集人都佩服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说得在理，纷纷抵制洋油洋火等日货，在这些斗争中，王凤岐受到了锻炼，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也开始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年轻的王凤岐开始成熟了。

一九二五年，王凤岐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济南一师当时是我省的摇篮，在这里王凤岐进一步接受革命教育，终于找到了组织。他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转为共产党员。从此投入革命活动。主要活动在德平、平原一带，组织进步学生阅读革命书籍，油印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又在家乡发展党员，组织农协，并且同当地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刘辛庄成为陵县最早的党的活动基地之一。随着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鲁北地区党的活动也展开起来，王凤岐参与了鲁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平原、德县、陵县农运一度高涨。王凤岐为领导农运事曾遭反动派的第一次逮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八七”会议决定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在全国各地发动秋收起义。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更鉴于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国民党右派的义愤心情，鲁北党组织决定发动鲁北各县农民暴动，成立了鲁北暴动行动委员会，王凤岐是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在平原县召集了鲁北地区下辖八县农运会议，决定各县分头行动，举行暴动，打土豪、惩贪官，建立革命政权。但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终因条件不成熟而失败。暴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加紧了对革命者的搜捕。王凤岐暂时离开家乡活动于济南、泰安一带，参加共青团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任团省委常委。一九二八年六月，鲁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为恢复和开展鲁北工作，省委派王凤岐以视察员的身份来鲁北指导鲁北党的工作。虽然其时敌人对王凤岐追捕仍很紧，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奋然前往。为便于活动，他化名为韩广德，领导了群众“抢集”、“抢坡”运动。这些活动虽然是在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出现的盲动行为，但是对于当时反动政府的气焰，也确实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一九二八年夏，山东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受大的破坏，王凤岐也于同年底在平原县被敌人第二次逮捕。在敌人法庭上，王凤岐大义凛然，表示活着就要干共产党，痛斥了国民党的贪官狱吏。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王凤岐因系共党重要分子案被解赴济南监狱关押，志士身陷囹圄之中，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是关锁不住的，在济南狱中王凤岐又参与了邓恩铭同志组织的第二次越狱活动。七月二十一日，狱中的革命者用信封制成灰袋，击倒狱卒，十八名同志冲出了监狱，在疏散过程中王凤岐等十名同志不幸被敌人追捕押回，遭到了敌人的残酷折磨。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凌晨，敌人将王凤岐等二十二名共产党人押至济南经七路、纬八路刑场枪杀，年仅二十岁的王凤岐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王凤岐虽然只活了二十岁，但是他的悲壮英勇，浩然正气，万古长存。

马振华传略

任天奇 张连生

马振华同志（化名叫李泽民），一九〇五年生，系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附近的后韩沙洲村人。该村是一个佃户村，马振华同志家是一户佃农，祖祖辈辈为地主当牛做马，终年过十分穷苦的日子。由于生活的煎熬，他的父亲早年患了眼疾，终于双目失明。艰难拮据的生活，不平等的人间现实，使马振华从小养成了深沉、坚强的性格，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形成了强烈的爱憎。

尽管生活艰难，但为了争口气，为了摆脱封建势力的愚弄，马振华父母决心供他上学。在家读了几年，又到李连庄小学就读。十七岁上，家里穷扒苦接 供 他读完了高小。高小毕业回村以后，他与志愿相同的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乡亲们的赞助下，办起了一所民众学校，专门招收穷人的孩子，使穷孩子得到了念书的机会。后来，马振华又在村里组织了一个“互济会”，全村贫雇农和一部分自愿加入的中农，每户出会费一元作基金，对会员低息贷款，轮流受益，使贫下中农摆脱了地主老财的高利贷剥削。

当时，在冀鲁边区一带，已经有了我党的地下活动，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天天盼着能够

找到党，马振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三二年，在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的教育和培养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在后韩村建立了党支部，马振华担负支部书记。以马振华为首的党支部，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群众首先进行了抗租斗争，接着又领导了几次抗税反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通过这些斗争，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和反动政府的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同时，马振华自己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和考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才干，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强了。

一九三四年，我党领导的马颊河大罢工失败以后，周围数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就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上级党调马振华同志当了津南特委的特派员。此后，他化名李泽民，以卖笔墨纸砚的“串书馆”先生的身份为掩护，活动在冀鲁边区的大地上，整顿被破坏了的党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力量，并利用各种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日夜奔波。

为了党的工作，为了革命的胜利，马振华成年累月在外面跑，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他母亲过世，父亲双目失明，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全部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马夫人一个人身上。但他顾不了这些，平时很少回家，甚至有一次他从自己的地头上路过，马夫人领着几个孩子正在地里拾棉花，由于当时正在执行任务，怕孩子见了缠他误事，他就装做没看见，低着头骑着车子过去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事业。